

“屠龙术”之众声喧哗

——胡亮诗学之路的“一与多”

刘朝谦

· 诗论家研究 ·

胡亮兄新著《屠龙术》出版，嘱为序。

胡亮，四川蓬溪人，蓬溪今属遂宁，故胡亮也可说是遂宁人。遂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首功归于初唐时期遂宁市射洪县之陈子昂。子昂既创作《感遇》诗，从实践方面为唐诗贡献由初入盛的路径，又以一篇《与东方左史公虬修竹篇序》痛批初唐宫体诗的陋习，倡导诗歌创作寻回建安的风骨，从理论方面为盛唐诗风的生成扫清了道路。余今为胡亮新著作序而言及陈子昂，无非在于二人虽身处不同的历史时空，却都同出于遂宁，足见遂宁自古以来就算说不上地有多么特别的灵秀，但文艺方面的人杰，却真正是辈出不穷；我为胡亮新著作序而提及子昂，亦在于陈、胡二人虽时隔千载，却皆不约而同致力于中国诗学弊端的批评与矫正，对中国诗学均做出了不俗的建树。

胡亮《屠龙术》对当代中国诗学的思与说，风格已成，全书在诗歌的世界里既自觉地技进乎道，又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挟南禅言语道断的感性机锋，敞亮目击道存那一瞬间的兴会感悟，为当代中国诗学走出一条不同于知识论诗学的路径，是足以代表当代中国诗学前沿水平的成果。胡亮《屠龙术》一书所建构的有温度的诗学，是从中国传统诗学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美丽花朵。

—

世界本质在人前最初的现身，总是以世界之名跃上前来。这就是说，当我们见到“屠龙术”这个书名时，我们不仅看到一本书的名字，而且，我们同时看到作者胡亮建构其诗学为一个世界的用心。在其用心之处，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在信仰之维，视诗学为神圣之物的态度。

书名所说的“术”，直指入诗与人思的技术，其与“屠龙”二字构成的词语“屠龙术”，则明言此处之“术”，乃是人类所有技术之中最为特殊的一种，“术”的特殊性来自于技术的对象，即“龙”。

在中国讲“屠龙术”是有风险的，哪怕在今天这个非帝制时代讲，也是如此。因为，中国语境中“龙”的特殊性在于，自神话时代起，“龙”即是神话之形象，传说之形象，是周族的图腾。在生命和权力二维，“龙”以其超越于人的力量和位势与人类关联，从而在人的世界里现身为神圣崇高之物。“龙”如此在文化和政治框架里作为神圣、崇高之物，将其作为屠宰对象，且讲述屠龙的技术，言说者就实际地将自己置于了渎神者的位置。对于胡亮来说，这种意义的“屠龙术”，当然不是他的书所要言说的意思。

胡亮“屠龙术”指谓的“龙”，同图腾、神话和王权之龙一样，都具有神圣性，但如果我们读了《屠龙术》书中具体的文字，就会知道胡亮是书所说的“龙”，是作者心中的诗学、哲学，此诗学、哲学是神圣之物。如龙一般，神圣而超越，让人见首不见尾，其存在之性状当如《周易》所说：“阴阳莫测之为神”。在此意义上，掌控如此玄妙的诗学和形上哲学的技术，可称之为“屠龙术”。

将掌控诗学的技术称为“屠龙术”，不管作者对此有着怎样的解释，这一命名本身是洋溢着浓郁的暴力性的，“屠”字本义为宰杀，用在诗学、哲学身上，当然不可能是“磨刀霍霍向猪羊”这种日常生活中血腥的行为。“屠”之对象一旦为诗学、哲学，则把它理解为庖丁解牛之“解”更为合适。因为，庄子写为寓言的庖丁解牛故事之“解”，首先保持住了“宰杀”的意思；其次，“解”指对宰杀对象身体的肢解；再次，“解”指肢解对象的技术；最后，“解”敞亮的主要是技与道的问题。庄子庖丁解牛寓言所说的“解”，因此是庄子关于人类经验、知识、技术和规律的哲学性质的思与说，胡亮的《屠龙术》一书在开篇处引到黄庭坚的《戏答史应之》诗句：“先生早擅屠龙学，袖有新刚不试刀。岁晚亦无鸡可割，庖蛙煎膳荐松醪。”黄庭坚明显即是在庖丁解牛的意义上来理解屠龙术的。胡亮的“屠”，虽然也把宰杀的意思带入到文本现场，但其实它真正要言说的，还是关于诗学、哲学经验和规律的梳理，还是关于诗学和哲学之知识、技道关系的解剖。正如胡亮在《屠龙术·后记》中所说的：“根本没有龙，屠龙术呢，就不得不归于形而上学。诗学、哲学，均形而上学也。在心则窈窕，入世则尴尬。”胡亮写下“屠龙术”三字为书名的那一瞬间，内心大约既满满地都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

志，善刀而藏之”^①的人道感觉，又时时可听闻到吾道无所用之的呻吟。

“屠龙术”相比较“庖丁技”来说，当然更显霸气，所以，胡亮兄日常温润如玉的另一面，恰如怒目金刚，尽显于其屠龙之当前。面对《屠龙术》这一书名，我们再看不见《虚掩》里因为“虚掩”而显得有些羞涩的胡亮，也再看不见《窥豹录》里那个温良恭俭让的胡亮。如果说“解牛技”多老年之从容的话，我们在“屠龙术”这里看到更多的则是少年胡亮的青春飞扬。从《虚掩》到《窥豹录》，命名者胡亮一步步远离了羞涩、含蓄，此时，杀伐果断的壮夫气性则越来越强大而张扬。“屠龙术”之名在胡亮自己的诗学道路上，似乎标示了胡亮至此终于步入自信之境。当诗人度过其诗歌人生的学习阶段，终于构建起专属于自己思与说的话语之时，此诗人即有归家之感，始从内向外散发自信的生命气韵。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的人生三大阶段，胡亮通过《屠龙术》一书的称名，宣告了他至此在诗学大地之上自信的迎风站立。

二

胡亮用“屠龙术”一词命名他的书，此命名行为令他不自觉地卷入到中国古代诗学的价值争论中去。中国古人对诗学的价值，一直存在是“虫”、是“龙”两种论断的争论。胡亮的立场，明确地站在了视诗学为“龙”的一方。这一立场的选取，对已经走过作家神圣时代的今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何况胡亮还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把诗学视为自己生命的人，如果他不把诗学视为神圣的“龙”，反而是令人奇怪的。

“龙”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话语范畴，用以描述诗学的崇高价值，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之书名。刘勰用“龙”作为文章书写活动之喻象，喻指文章书写活动不是小道，是具有崇高意义的行为。该书《序志》篇将文章定性为经典枝条：“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经学经典是天地人三才世界最为神圣之书：“三极彝训，其书言经。”^③经典的神圣性令人类的一切书写都带上了神圣的气性，在古代中国，罗兰·巴特所说的作家神圣时代，最早正是刘勰宗经的诗学观给予奠定的。刘勰以经学的名义，命名经学经典，以及经学经典宰制下

① 《庄子·养生主》。

② 《论语·泰伯》。

③ 《文心雕龙·宗经》。

的人类书写行为为“龙”，命名书写与文本之用心为“龙”。他所谓“文心雕龙”者，实质是讲他的书写是在“雕龙文心”，“龙”即“文心”，二者皆为雕琢（即研究的意思）之对象。

刘勰称文章书写活动为“龙”，肯定了人的书写具有极崇高的价值，他的观点在先秦儒家和经学的话语里，属于叛逆的说法。其直接反对的文章价值论，应当是扬雄针对汉大赋写作提出的“雕虫”论。

扬雄于自己人生之后期，弃赋文学之路而改投经学门下，当其时，他反思自己的赋文学人生而有悔意，在赋学上提出著名的“雕虫”论。他在《法言》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①扬雄“雕虫”论以经学的名义，视诗学为小技，其论在扬雄之后的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往往被视为真理。刘勰在齐梁时期提出“雕龙”之论与之分庭抗礼，以经学之名强调诗学之崇高价值。然而，至唐、宋，中国古人皆知扬雄文章小技之论，甚少有人知道《文心雕龙》这本书。中国人因此迟至近代之文学观念引入，才对刘勰的“雕龙”论给予高度的关注，才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文学价值论断。胡亮兄的书基于刘勰而有别于扬雄，应该是持守中国今日的文学观念为根本的诗学立场，有所选择地引中国古代诗学为自己所用。

在刘勰和扬雄之间，胡亮既取“龙”为书名的核心内容，就同刘勰近而离扬雄远。但是，刘勰将“龙”言说为诗学家雕琢的对象，胡亮将“龙”言说为诗学家屠宰的对象，则二人虽同样在说道诗学的崇高价值，但处理诗学的方式和态度，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或者说，胡亮的诗学立场虽然有中国古代诗学深重影响，但是，胡亮诗学之路的支点，依然是他自己当下所处身的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人生和诗学的问题，是他体认这些问题时的个人化的行为与焦虑。所以，当刘勰说诗学如经学经典一样有大用之时，胡亮却正痛苦于诗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无用。胡亮的诗学无用论当然映射的是当代美学所说的美即无功利之物的观点，这与先秦儒家和汉代经学所说的文章小技之论，同样似是而非。胡亮所面对的是让诗成其为诗的超乎功利特性，诗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因为诗的超功利性而得到持守和生发。这也就是胡亮所说的，诗学无用，但诗学恰因此而是崇高之“龙”。胡亮在此遂与扬雄诗学观区别开来，他不会像扬雄那样，因为认定汉大赋无益于讽谏，从而得出诗学即“虫”的结论。

胡亮自己对“屠龙术”的解释表明他是在诗学价值论层面来言说这

^① 《法言·吾子》。

一术语的，胡亮在书的扉页告诉读者，“屠龙术”一词，源于庄子。《庄子·列御寇》有言：“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庄子这段话涉及技术的价值判断问题：技术的交换价值和技术的使用价值。朱泚漫用去的“千金之家”是屠龙术的交换价值，“无所用其巧”是屠龙术的使用价值。庄子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屠龙术是一种真正存在的技术，这种技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龙曾经存在，或龙于当下的确还在某一个一般人进入不了的特殊时空维度内存在。龙的存在作为事实，生产了屠龙的技术。二、在朱泚漫学技的时代，屠龙的技术还在，但龙已经不再在凡人的世界现身，这造成了此时的屠龙术是一种无对象的技术，因为无对象，所以，掌握屠龙术的人的现实处境只能是“无所用其巧”。三、人花费极为巨大的货币换得一种“无所用其巧”的技术，是一种不智的行为。对于主张人生存于有用和无用之间的庄子而言，屠龙术无论有用还是无用，其实都是不被肯定的。胡亮依庄子的语用而命名自己的书，在所指层面，有着不同于庄子的考虑，如果说“屠龙术”在庄子那里是生存论的术语，那么，在胡亮这里，“屠龙术”乃是诗学或形而上学之术语。在诗学的价值框架内，诗歌之美作为无用之物，却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所在，是集聚诗学意义的核心。诗的这种依无价值而有价值的特质，让人“无所用其巧”的屠龙术也因此充满了价值，值得胡亮给予书写。

人一旦要对诗学思与言说，就必然要涉及对方法和路径的选取。胡亮的选取，是自觉地上承中国古代诗话言说诗学的路数，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从‘文体’的角度看，本书或学步于中国传统，又承接于西洋现代风尚。什么样的传统呢？就是钟嵘《诗品》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降的诗话传统，王国维《人间词话》、吴宓《空轩诗话》和钱钟书《谈艺录》则是这个诗话传统的豹尾。”^①对诗人、学者而言，承接前见已经不易，而能出乎于前见，则更难，胡亮虽然从中国古代儒道诗学传统步入诗学的思与说，而又做到了出乎传统，《屠龙术》一书正是因此而让自己的言说，真正是作者自己的一家之言。

三

选择何种方法应对诗学问题，往往是由所要应对的诗学之特质所决

^① 胡亮：《屠龙术·后记》。

定的。《屠龙术》言涉中国当代诗学与哲学问题，这决定了《屠龙术》所依托的中国古代诗话传统不具备存在论的性质，而只是作者切入当代中国诗学问题讨论时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当代中国诗学的存在维度由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给予限定，支撑中国传统诗话的存在地基，即亚细亚农耕社会早已历史的消亡。《屠龙术》在当代语境对中国传统诗话的使用，只能是对一种工具的使用。而且，注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传统不会是《屠龙术》所使用的唯一工具。

中国诗学之当代品质从结构上讲，是古代、现代和后现代诸种中国诗学品质的层累叠加，结构的中枢，以及结构在功能上所要应对的对象，是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诗学之处境与危机。这个中枢，以及显现这个中枢的现代汉语，是当代中国诗学的存在之家。当代中国诗的现代和后现代处境，诗歌歌吟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生命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诗学问题，更多地同全球化语境相关联，当代中国诗学的这些内容使得对它们的思与说离不开西方现代、后现代诗学话语，决定了《屠龙术》虽然自觉从中国诗话传统切入中国当代诗学问题的讨论。但是，这并不表明作者在诗学上是一个复古主义者，真正的诗学复古主义者，像马一浮这样的人，他们对西方诗学资源是全盘拒绝的，而胡亮则明确表示，他在中国诗学传统之外，还“承接”于西方诗学。《屠龙术》兼采中西，在整体上因此属于消极自由主义诗学，这种自由的性质，具体地表现为《屠龙术》里关于诗学的思与说的基本话语形式是众声喧哗，众声喧哗的情形正如巴赫金青年时代所居住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样，多元话语交织而成的世界到处是自由和宽容的空气。《屠龙术》在一个地方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如是说。”“意胜则冗，词胜则拘。”在另一个地方则说：“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Achille-Claude-Debussy）已然不耐烦，他显然加快了语速，‘哲学家们总是分析，分析，冷冰冰地毁灭秘密’——音乐家或可搭救这些可怜的哲学家。”“查尔斯·威廉斯·莫理斯（Charles-William-Morris）的‘语形学’，用于研究‘指号’之间的关系，或可借用其名称，建立‘字形学’，用于研究汉字和汉字组合的视觉效果。”这样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观，在本质上是典型的后现代画面，作为诗学话语，它既不专重“子曰”，也不只认“康德说”，喧哗的众声在《屠龙术》中构成的是全球化话语的混响，它们齐聚于《屠龙术》一书中，只是为了让相关的诗学问题得到解决，让相关的诗学现象得到准确的描述和体认。《屠龙术》书中各种诗学话语之间，弥漫着的是后现代特有的文化多元品质、多元诗学话

语的相互对待与共处，让《屠龙术》全书在思想上洋溢着后现代性质的民主气息。

胡亮在喧哗众声中一定要强调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应该源自于他对当代中国诗学过于知识化的焦虑，这一焦虑使他看到德彪西怒斥哲学家只知分析的话时，特别兴奋，直接说那些只知道分析的哲学家是需要搭救的。在胡亮的眼里，诗学在当代又何尝不是这种一味强调分析的社会科学呢？

今天的诗人通常把大学文学院或中文系所承载的中国当代诗学看作是学院派诗学，在诗人的认知中，学院派意味着诗学话语的知识质态和八股气息，学院派承载的中国当代诗学话语完全脱离了诗歌本身的审美体验活力，从诗的美学变成了诗的科学，这种知识化、科学化、八股化的诗学自然是需要搭救的。用中国古代诗话传统做工具解读当代中国诗学，应是胡亮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的搭救方法之一种。

胡亮借用中国诗话传统来言说中国当代诗学，有其合法性依据。但其借用是否具有有效性，却不是无条件的，毕竟，中国传统诗话在当代中国诗学话语场域里，它已经边缘化。

中国古代诗话传统准确地讲，起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主要的书写形式，它的特点在于：一、诗话往往是由诗人来言说的，欧阳修就是创作很有成就的一位诗人，后来像《董斋诗话》的作者王夫之、《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等，也都同是诗人。二、诗话因为是诗人对诗的言说，通常是关于诗的审美体验话语，诗话话语感性、生动，是言说者用生命言说的话语。诗话因此并不在意知识之为知识的抽象逻辑和理性品格，它所热衷的是言说者在面对诗之当下瞬间的领会与感动。所以，我们在诗话里哪怕看到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极深刻之诗歌理论观点，对这观点的呈现，也总是吉光片羽，不成段落的表述。中国古代诗话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从来不依理论逻辑，来展开诗学的思想或理论观点，来把观点体系化为庞大的理论。

在当代中国，中国诗话传统长期以来是被束之高阁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致说来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一、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走向共和制国家，“赛先生”和民主精神进入中国，旧式教育被西方教育体制取代。旧式教育的消亡意味着古代文史哲的中国式话语失去传承，也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用武之地。二、中国诗话传统是基于文言抒情诗的诗学话语，20世纪初那场用白话文取代言言文的革命对文言文的摧毁，也是对中国文言诗时代的抹除，语言作为人存在的家园，它

的改变从来不只是一种工具的改变,而总是人自己的存在之家新旧交替,是人关于这个家之存在感的根本改变。当现代汉语成为当代中国诗歌活动主要的语言形式,人们在其中的存在感的整体变化必然导致当代诗歌之审美感觉的全面变化,从语言形式到语言传达的生命感觉,当代中国诗歌活动已经构筑起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诗歌活动在总体上确实已经无法用诗话话语来言说。三、自上世纪初西方教育体制取代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之后,文艺学正式成为现代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科,文艺学通过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建构起诗学在当代的知识谱系和思想理论框架,最终把西方自18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传播到全社会。这种新文学观念强调诗歌是独立的,自足的审美活动,诗歌被认为专属于文学学科,不再只是政治或道德的工具。同时文艺学的学科意识让文学自觉地区别于历史和哲学学科,诗话传统特有的文史哲不分的话语格局被历史地终结。立基于文艺学学科的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成为中心话语,诗话话语随之边缘化,或被遗忘。在现代学科制度下,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献资料被统统拆分,放置入西方文艺学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中,成为科学分析之对象。四、当代中国的诗歌理论言说和诗歌批评主要由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来承担,而这些专家学者多数并不写诗,他们对诗歌的理论思考,对诗作的批评整体地与诗歌创作环节脱离,话语体现出十足的知识化、科学化质态。诗人这个群体则整体地生死于大学围墙之外,他们中的少数人对诗歌理论的道说和批评虽然更多地避免了学院派诗学的毛病,但往往不被墙内的诗学专家重视,他们关于诗学的声音进不了当代社会科学体制,只好在诗人的同人小群体中博得喝彩,在学院的墙外自生自灭。

学院派诗学和诗人的诗学构成了当代中国诗学的两极,居于中心的是学院派诗学,诗人的诗学则处于边缘的位置,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是很好,中心和边缘对另一方通常保持轻视的态度,因此,在诗学体制框架内,两种诗学实际上做不到相互取长补短。如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学院派诗学同创作相脱节的弊端一直得不到改变,中国当代诗学总体上的知识化、科学化质态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诗学的知识化和科学化一旦成为诗学的具有霸权性质的话语,一旦把诗论、诗评主体不必写诗当作理所当然的常态,诗学本身就的确正在成为一种伪诗学,当一种号称诗学的话语只有科学知识的冰冷,全无诗本身的温度;只有八股文式的僵直和腐臭,全无诗本身的灵动和鲜活生机,这诗学就必然是有名无实的伪诗学。

行走在中国传统诗话道路上的《屠龙术》乃是对这样的伪诗学的搭救，而伪诗学的客观存在则为《屠龙术》的古代诗学立场选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胡亮在《屠龙术》书中刻意让自己的诗学话语立足于中国古代诗话传统，直接是对当代中国诗学科学化、知识化的批判，批判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首先，诗话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要话语范式，其对诗学的思与说主要是体验性的，对诗的理论思考不呈现为抽象的逻辑表述，不是关于范畴和命题之逻辑关系的理性建构。诗话由于是诗人对诗的理论言说和批评，因此，它总是尽量保持在诗歌活动的某一当下的具体处境中，创作也好，批评也好，诗话总是尽量在主体与对象初次相见的第一时间来说诗话的美妙之处，来说诗话在这一瞬间开启的意义与价值。诗话的这种近似于现象学的道说方式，使它即便在当代中国诗学的话语场域里，也可以是最为优良的工具。因为，中国当代的诗歌虽然已经以现代汉语为自己存在的家园，书写的已经是人的现代和现代生活，但是，现代汉语诗歌在创作环节中涉及创作与现实生活之关系、创作心理活动、创作主题的确立与创作素材的选取、诗歌文本书写的修辞技术、言意关系等诸多问题和解决之道，是可以在中国传统的诗话话语中得到帮助和启发的；在涉及诗歌文本的结构描述、语言解剖和意象、意境之分析等方面，古今诗学亦有一脉相通之处。至于诗歌的接受环节，当言涉接受主体与诗歌文本的各种关系的讨论之际，中国当代诗学也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很多问题在古代诗话中其实早就是古人所苦恼的地方。总之，相对于中国古代诗学而言，中国当代诗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诗歌活动的很多东西却未曾改变，这些未曾改变的地方，使得中国古代诗学可以作为工具进入当代诗学话语场域，可以在当代诗学的运用中被改造为当代诗学本身，至少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之进入中国当代诗学，让当代中国诗学既是当代的，同时又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让中国当代诗学既具有后现代众声喧哗的全球化味道，又具有鲜明的民族身份。

总之，在科学成为神话，且主宰了诗学的当代，借中国古代诗话话语“返魅”，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在当下，中国古代诗学诚然已经无法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家园，但当代中国诗歌家园的建构却又的确是可以用之为有力工具的。毕竟中国古代诗话话语在持守诗本身方面有知识化、科学化诗学所不具备的力量，其思与说能让诗之非知识、非科学的本质更本真的敞亮出来。正因为中国古代诗学总是在诗本身中去洞见诗的本质规律，去生长出诗学的问题意识，去创建出诗学的范畴和

命题，所以，它总是把理论之思同感性的言说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相对于知识化和科学化的抽象诗学而言，它总是因为赋予诗论、诗评以感性的肉身，而能让自身显现为一种有温度的、柔软的和性感的诗学。当代中国需要这种诗学，需要这种保持住了诗本真的存在性状的诗学。

在叙事的时代守望诗，是需要勇气的；在文学终结论的声音四处响起之时，谈论文学是荒诞的；在图像的、娱乐至死的世界里，试图成为诗人中的诗人，光是这念头就多少已经陷入堂吉诃德式的处境。但是，越是世界步入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子夜时分，平凡之人就越是应该感激那追踪远去诸神足迹，守护世界平安，也守护诗学残存之地的人。胡亮用《屠龙术》实际地尽着守护者的职责，《屠龙术》作为搭救之光亮，已经先于我们抵达诗学之深渊，在敞亮深渊的那一瞬，搭救就已经生效，该书词语此刻照亮的也许只是一条模糊的小径，但真正的拯救之路，自然带有先天的神圣和高贵。

祝胡亮兄诗学之路高贵的开启，是为序。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